草地 书话

充和一生的五个贵人和一个福地

绿茶

一个多月前，坐高铁去青岛，参加王道的《一生充和》首发，路上看完这本书，有一些想法想向作者王道请教，但短短的青岛几日似乎没有机会。首发式上，我作为嘉宾主持，似乎不太方便多嘴。

一个月后，坐高铁去苏州，参加韦力先生《书楼觅踪》读书沙龙，又见到王道先生。为请教方便，提前把想法书录如下——

合肥张家四姐妹都是才女，其中四妹张充和更是多才多艺。王道新作《一生充和》书写张充和平凡而充盈的一生，让我们看到一位民国才女在乱世中的命运选择和艺术追求。王道先生用 8 个地标串起充和的一生，儿时的合肥、少女时期的苏州、中学时期的上海、养病时期的青岛、避难时期的昆明、抗战时期的重庆、北平时期的姻缘、美国的后半生。

一个福地：青岛

这种地域式历史书写，非常清晰地勾勒出充和一生的人生路径，每个地方留下她不一样的印记，也代表了她不同时期的人生选择和境遇。在这所有的地标中，青岛是一个分水岭，也是充和的“福地”。“福地”一说是王道先生在青岛首发式上的说法，我非常认同。王道说：之所以来青岛举办首发式，是因为青岛是张充和的“福地”，她虽然在青岛呆的时候不长，但这里是她人生的分水岭。通过在青岛一年多的疗养，充和真正实现了重生，从原来对自己人生的绝望，到大病痊愈后的积极人生。

首发前一天，王道和我专程去找张充和当年在青岛时的居所，位于太平路一栋叫静寄庐的别墅，是南浔儒商刘锦藻的旧居。我们在太平路《青岛日报》社附近下车，爬进一个围墙，里面有很多老别墅可见。《一生充和》中收录了一张充和在别墅前的照片，我们对照着照片去找，始终不见照片中那栋别墅，后来见到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仔细端详照片，说照片中的地方已经拆了，这栋别墅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虽然略感遗憾，但眼见这片海域真是适合疗养，虽然现在游人如织，但当年这片区域一定美如画，让充和感受到人生的美好和对未来的无尽想象。

合肥四姐妹是民国大家族的典型代表，围绕她们家族构成的朋友圈非常厉害，几乎整个民国文化圈人士都能出现在她们朋友圈中。读完这本书，大致有 5 个贵人对充和的一生非常重要。

第一位贵人：叔祖母识修

张充和还在襁褓中时，就被抱到合肥老家龙门巷，由叔祖母识修收养。识修是李鸿章四弟李蕴章的女儿，嫁给张树声次子张华輔，李鸿章和张树声是淮军一二号人物，两个家族几代联姻。张华輔去世得早，识修自此皈依佛门成为一名居士，打理家族留下的产业，识修在家族中有无形的魔力和威信，对充和更是无限关爱。

当充和一点点长大，识修就开始四处为她物色好的老师，她对充和寄予厚望，不希望充和因为被自己抱养而在学业上落后，为了请到名师，她不惜花几倍的薪金。其中有六安的才子、举人左履宽，负责教她古文、诗词，考古专家朱谟钦，是吴昌硕的弟子，负责教充和书法。张充和天资聪颖，悟性甚高，4 岁会背诗，6 岁识字，如是 10 年，闭门苦读《史记》《汉书》《左传》《诗经》等典籍。充和一直铭感这两位恩师为她奠定了国学的功底。

识修为充和精心构筑一个固定的课堂，也无意为她开辟了第二课堂。她的信仰给了充和哲理、禅意和悲悯，或者说是一种修行。

充和 17 岁那年春天，一生行善的识修去世，享年 67 岁。合肥龙门巷张公馆一草一木，每个细节都深深印刻在充和记忆中。识修的离世，张公馆突然空了，那些点点滴滴构筑的生活突然坍塌了。充和将离开这里，回到久违的苏州九如巷的“家”。

识修留给充和的不仅有不菲的家产，更重要的是建立起她童年的人格以及对旧学、旧物的执念，童年的影响，可以说奠定了她人生的底色，是抹不去的修养。

第二位贵人：昆曲老师沈传芷

1930 年，叔祖母识修去世后的那年冬天，充和回到苏州九如巷，就读父亲张冀牖创办的乐益女中。父亲是个新派教育家，他创办的乐益女中开设昆曲、美术、戏剧、花木、烹饪等新式课程，培养孩子们昆曲爱好，也鼓励孩子们走出去，接受更多新学。

父亲张冀牖和继母韦均一都是痴迷的曲友，不仅把昆曲课开到乐益女中，同时请来“传”字辈中的佼佼者沈传芷、张传芳等来教学。后来充和主要跟沈传芷学习昆曲，沈传芷得承家学，祖父、伯父、父亲、叔叔都是苏州昆曲名角，沈传芷面相清润、温文尔雅，唱腔清脆、嗓音和润，善工正旦，一度在上海滩活跃，后辗转京津等地传授昆曲。

> “合肥张家四姐妹都是才女，其中四妹张充和更是多才多艺。王道新作《一生充和》书写张充和平凡而充盈的一生，让我们看到一位民国才女在乱世中的命运选择和艺术追求

▲抗战前的张充和。**照片来自网络**

充和一生遇名师无数，除了童年时期诗词名师左履宽，书法名师朱谟钦，重庆时又拜书法大家沈尹默为师，此外，主要的老师阵容中有昆曲大家沈传芷、张传芳、赵阿四、李荣生等。昆曲，让充和发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不同的自己，沉醉其中。

虽然充和多才多艺，但昆曲无疑是充和人生的主调，是她一生最为倾心和热爱的艺术。从这点来讲，她的昆曲老师们都是她的贵人，而沈传芷更是她最珍贵的领路人。她生病后选择去青岛疗养，也跟她老师沈传芷当时正在青岛传授昆曲有关。还有她大弟张宗和当时正准备去青岛度假，她们姐弟俩年龄相近，感情最好，又是铁杆曲友。

第三位贵人：赏识充和的胡适

胡适先生和充和的交集并不多，但在两个关键事件上给了充和重要的支持。

一是，从上海光华附中毕业后，张充和用一个假名字张旋报考了北京大学。由于从小的国学功底，充和国文考了满分，但数学却是零分。为了录取这名偏科生，当时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费尽脑筋，力排众议录取了张旋，充和也被报纸称为“北大新生中的女杰”。

来到现代式大学，充和对未来充满希望。当时北大中文系名师济济，教授有钱穆、冯友兰、闻一多、刘文典等，这样豪华的教授阵容，使张充和受益良多。但充和真正的兴趣还是昆曲。此时大弟宗和在清华大学历史系，结交了一班曲友，充和也加入进来。张充和、张宗和、章靳以、卞之琳等曲友几乎形影不离。

大三时，充和因患肺结核病休，没能拿到北大学位。她先去了香山疗养，而后转青岛疗养。

二是，虽然中途因病辍学，但胡适对当年的偏科生张旋(充和)很赏识，所以，在充和大病痊愈后，力邀她到南京《中央日报》编副刊《贡献》。同时写散文、小品和诗词，初露文学才华。

充和去美国后，和胡适先生还有一些交集，当胡适先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客座教授时，充和正好就在这所大学图书馆工作，胡适先生常常来借书，却不会填表申请，充和则代劳。闲余，胡适常来充和家做客，胡适和傅汉思也是老友。

第四位贵人：三姐夫沈从文

充和特别喜欢和信任三姐张兆和，遇到事情总向三姐求教，后来去上海光华实验学校读中学也是因为三姐在光华教书。所以，当沈从文到张家求婚时，张充和特别在意，心想这是什么人，居然要娶三姐。短暂了解后，原来是一位很会讲故事的作家，温文尔雅，缺乏自信却义无反顾，最终实现自己爱的梦想。

大病痊愈后，中国陷入连绵战火，充和开始四处避难，1938 年来到昆明，西南联大精英们汇聚于此。充和与三姐、三姐夫沈从文一家住在一起。当时沈从文是西南联大教授，同时负责主编教育部《中学国文教科书》，因为充和古文和诗词的功底，沈从文向西南联大秘书长和教育部代表杨振声举荐张充和参与教材编辑。虽然在避难中，但昆明两年，充和过得相对安稳。

除了事业上的相助，沈从文也间接成为张充和与傅汉思婚姻的“红娘”。

抗战胜利后，沈从文一家回到北平，1947 年，充和也到北平在北大代课，教昆曲和书法，借住在三姐家。沈家是当时北平文化人聚会雅集之所，杨振声、朱光潜、梅贻琦、贺麟、冯至、卞之琳等都是沈家常客。1948 年 3 月，中老胡同 32 号沈从文家迎来一位洋客人，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他因为钦佩沈从文的文学才气，通过季羡林介绍来认识久仰的沈从文。

没想到，这个老外和沈从文两个孩子龙朱和虎雛打成一片，经常来沈家作客。这个直接、单纯又兼具中国儒雅的西方人引起了充和的注意，慢慢地两颗心开始接近。沈从文也在观察这位洋先生，他觉得傅先生对充和比对他更感兴趣了。此后，每次傅汉思来，沈二哥直接说“充和”。孩子们也渐渐感到他们之间的要好，一看到傅汉思就嚷嚷“四姨傅伯伯”。

1948 年 11 月 19 日，德裔美籍教授傅汉思与北大教师张充和在北平结婚。这一年，张充和 35 岁，傅汉思 32 岁。

1949 年 1 月，张充和与傅汉思乘坐“戈登将军”号前往美国。

从沈从文第一次到苏州向兆和求婚开始，到 1949 年充和离开中国，这 20 多年来，充和与三姐及沈从文多数时间都在一起，三姐是充和的贴心姐姐，姐夫沈从文无疑是充和重要的贵人，从事业到爱情，都有沈二哥直接或间接的相助。

第五位贵人：丈夫傅汉思

晚来的爱情总是那么热烈，虽然他们结婚匆忙，但充和的后半生和洋教授傅汉思终生厮守。

刚到美国的那些年，他们的生活并不顺利，两个人都没有全职固定的工作，他们先去了汉思父母所在的斯坦福大学短暂工作，后来在朋友帮助下，两人进入加州州立大学做事，傅汉思从事中国史文化研究，充和在图书馆负责中文图书编目。艰难的生活一直持续了 10 年，直到 1959 年，傅汉思拿到博士学位，进入斯坦福大学任教(全职)，他们的生活才算安稳下来。1961 年傅汉思被耶鲁大学东亚系聘请为副教授，不久后，张充和也被耶鲁大学聘任，开设昆曲、书法课程。

这期间，很多国内朋友都劝充和返回祖国，但她并没行动，她让汉思安心做他喜欢的专业研究，自己更多承担家庭事务，因为她看到汉思对中国文化的倾心和专注。充和将她的书法艺术归功于汉思的支持与贡献，她的书法第一读者即汉思。汉思对妻子充和的昆曲事业也是全力支持，把妻子的昆曲事业当作自己工作的一部分，每次演出之后，汉思都做了演员、笛子、后台、解说等各方面记录，留作后续探讨和研究。

汉思不愿意把妻子充和置于常规之下，她应该像诗人一样自由主张，妻子的经历就是汉思研究中国诗歌的参照，他们看似寻常的相处，又被赋予了神秘的诗意。

充和有时候会想，自己贪恋的，不过就是那一幕幕人间曲。她带着昆曲走过万水千山，最终落户在异国的北港。从离乱里脱身而出的四小姐走进自己的人生小园，如同她一笔一画写出来的人生小楷。

草地 原乡

当割麦子变成审美活动

张丰

著名作家刘震云在北大演讲的时候，为台下的毕业生讲了自己外婆割麦子的故事：1900 年出生的外婆，曾给地主当长工，但是她却是方圆几十里的一个明星。每次割麦子的时候，她都是头把镰。“头把镰是什么？就是第一提琴手。她把麦子从这头割到那头的时候，一米七八的大汉，才割到地头中间。”

他外婆有先天优势，个子矮小，只有一米五六。当然，老人家也有诀窍：割麦子的时候，只弯一次腰，弯下就不站起来了，直到劳作结束。如果你站起来一次，你很快就会站起来十次，每隔几分钟就要站起来一次，这样，你最后会成为整个田野被取笑的对象。

我初中的时候，开始到田里割麦子。我就属于那种很快就站起来的人。坐在台下听刘震云演讲的孩子不会知道，割麦子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劳动。你可以试一下，弯腰，用手尽量触碰到脚前面的土地，这些都是瑜伽老师才能完成的动作。

使用镰刀的时候，要尽量把刀面贴着地，这样，麦茬才不会太长，方便接下来种玉米。个子稍微高一点，就没办法采用弯腰式，只能采用蹲式。蹲式的好处是腰不累，但是腿又受不了，而且留下的麦茬很容易扎到你。还在读初中的我，两种姿势都无法适应，每一种都很痛，只有站起、弯腰、蹲下，不断变换动作。

我起身抱怨腰痛，大人一阵哄笑：小孩子，哪有腰啊？于是又蹲下、弯腰，一个小时后，就被别人远远地抛在后面，独自面对金黄色的麦穗。如果你落后太多，而且没有任何赶上来的希望，你就会放弃。父母都割到前面去了，我甚至会偷偷坐在地上休息。弟弟比我要厉害一些，他很快发现了不公平：有人多做，有人少做，这怎么行？他提出的方案是，每人划定同样大的收割区域，谁先干完谁就回家。

> “既然人们不再向土地臣服，土地也就不再需要这么多人了。农村出现了大量闲置人员，像我这一代青年，还没来得及学会农活儿，却又永远不需要再学

这种收获，对我来说没有丝毫的喜悦。虽然还是少年，我就开始怀念童年了。如果不用参加劳动，整个麦芒时节还是很浪漫的。看着大人慢慢把麦子割下来，拉回麦场暴晒。他们累的时候，会到树荫下喝水、休息，我喜欢在这个时候和大人聊天。劳动中的人是最健康的，他们豪爽地开着各种玩笑，丰收的喜悦挂在脸上。

参与割麦，是一个人开始长大的标志。父母们都很心疼儿女，不到一定年龄，舍不得把他们赶去夏天的田野。从割麦子开始，一个男孩就要学会做一系列农活。下午的时候，要用牛拉着石磙在晒得很脆的麦秆上碾压，让麦子和壳分离，还要观察风向，把麦子撒向空中，借助风的力量，除去灰尘和碎壳。这是最有技术含量的，真正的高手，撒出去的麦子，自然成为干干净净的一堆。

这样的技术，让我羡慕，也让我发愁。几百上千年来，这都是一个男人必须掌握的技巧，我注定会成为麦场上的失败者。

没想到的是，我读初中的几年，其实是传统农业技艺最后的辉煌了。初三的时候，村里开始出现收割机。最初的收割机非常简陋，也非常狰狞，镰刀像獠牙一样暴露在外面。但是，它只负责把麦秆放倒，你还需要在田里暴晒，然后拉回麦场，进行下一步。

我家保守又节约，几乎是最后使用收割机的。我考上了高中，这可以让我理所当然地逃避农活，但是想到父母却又深感不安。好在机器的变革超乎预料，很快就出现了脱粒机，把收割机放倒的麦秆收回去，一点点塞进脱粒机中，它就会把麦子吐出来。很快又有了新式收割机，把收割和脱粒的功能结合起来。它们个头巨大，在田野里驰骋。感谢它们解放了年迈的父母。

这种巨型收割机毕竟无法像人一样，深深地弯下腰去。它留下的麦茬太长了，这给接下来点种玉米、大豆等秋季作物带来困难。它从田里碾过，土地变得结实，这让锄地变得无比艰难。但是，几乎是无缝对接似的，田野里又出现了专门播种玉米和大豆的机器。农民们只需要带着钱，在地头等待，就可以收割、播种。农活儿，从来没像现在这么轻松过。

刘震云在演讲的最后，对北大学生说了这么一句充满诗意的话：“举起你们手里的探照灯，照亮我外祖母没工夫直腰的麦田”。其实，在上世纪 90 年代，这样的探照灯就已经出现了，短短的两三年时间，河南农村就实现了机械化。人们再也不需要那么艰难地向土地弯腰了。如今，媒体通过无人机直播的麦收画面，看上去更像是一场审美活动。

这种变化是无比深刻的。既然人们不再向土地臣服，土地也就不再需要这么多人了。农村出现了大量闲置人员，像我这一代青年，还没来得及学会农活儿，却又永远不需要再学。大量青年开始涌向城市，他们偶尔回来，连自己家的责任田都找不到。照看土地的人，还是父亲那一辈，他们普遍已经六七十岁，但是在机器的帮助下，他们仍然游刃有余。粮食产量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农村却在一夜间变老了。

草地 观影

许式抗日片打捞庶民史

尘雪

7 月 1 日上映的香港导演许鞍华新作《明月几时有》在热闹的暑期档里，收获了并不高的口碑(豆瓣评分 7.0)和票房(首周票房约三千万元)。然而，这部带些文艺气质的抗日“主旋律”影片，在庆祝香港回归 20 周年的节点上映，恰合时宜。许鞍华做了一件打捞那段尘封的香港人民抗日史的好事。

在有限史料的基础上，许鞍华和香港编剧何冀平(曾创作《新白娘子传奇》《黄飞鸿》等)竭尽所能地讲述了这样一段历史：“香港市区中队”队长“方姑”(周迅饰)和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短枪队”队长刘黑仔(彭于晏饰)为代表的仁人志士，在 20 世纪 40 年代风云变幻的香港展开危险的地下抗日工作。

片中，历史上著名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生死大营救”事件是重要的叙事线索——彼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克服重重困难，将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数百文化名人及爱国民主人士成功营救出战火纷飞的香港。此后，方姑利用自己本地人的身份优势，为抗日地下组织传递抗日所需情报和物资。短枪队也躲过重重日军关卡运送枪支、枪杀汉奸，另一条线是霍建华饰演的国文教师李锦荣、春夏饰演的英文翻译张咏贤等潜伏在日本宪兵队的“卧底”获取情报、惨遭杀害……

相比拍摄大陆人抗日的电影，讲述香港地下抗日游击队的片子着实不多。该片让我想到香港导演陈德森 2009 年的电影《十月围城》——讲述的是 1905 年香港中环的一帮戏班班主、车夫、小贩、乞丐等保护孙中山逃离清廷追杀的故事……还有，同样讲述抗日地下情报工作者的电影《风声》系列。《明月几时有》明显没有《十月围城》《风声》系列那般扑朔迷离、充满悬疑，情节跌宕起伏。但相比同为港大校友的香港导演许婉婷拍摄的《三城记》，《明月几时有》不局限于乱世佳人才子的爱情故事，而是更专注以香港人抗日为主线。

同去看片的朋友说，《明月几时有》不适合在电影院观看，言下之意，该片超出她在影院观片的审美期待，没有看到适合在大银幕上观看的抗日大场面，她有些失望。确实，我们自小习惯的影像体验是——抗日战争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历史大事件，充满大战役和游击队、沦陷区军民的小战斗，中间涌现出无数英勇事迹，共同构成了历史见证。

> “许鞍华拍出了最像真人的抗日英雄，他们在历史中微不足道，注定会被遗忘，然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却是具体而沉痛的，正是这种轻与重的对比，赋予影片打动人心的力量

《明月几时有》不一样，它更加碎片化和细节化，更专注战乱时期的普通香港老百姓，呈现了一幅烟火之外的乱世庶民史与市井图——父母为生计发愁，结婚的夫妇一切从简，情侣告别甜蜜相依的时光，停课的师生加入地下情报工作……

在这个时代，每一个从被灌输价值中成长起来的人，对于主义、革命以及一切看似巨大但实则苍白空洞的词汇，有着本能的抵触。而许鞍华试图在《明月几时有》中弱化宏大叙事，将历史中的“传奇”英雄人物呈现为有七情六欲的平凡个体。例如，方姑因无法成功营救受自己连累的母亲而痛苦得蹲在路边哭泣；也会在做地下工作的间隙路过家门，给母亲捎带一袋米或两条咸鱼；抗日小鬼队成员的抗日经历充满私人情怀，他对方姑老师有着强烈的爱慕之情……

又或许，对香港普通人来说，“抗日”原来并不是坚如磐石的信念，并不是他们心中都怀揣一个清晰的光明未来。也许，参与“抗日”只不过是冥冥之中命运不明就里的安排。

方姑走上“抗日”道路也是如此。作为一个教国文的文艺女青年，方姑崇拜租住在家中的茅盾先生，因而协助刘黑仔带领茅盾等文化人士离港，她后被刘黑仔发展成“游击队”市区中队成员。

而叶德娴饰演的方母参与传递情报，更非因为相信某个信念，在我看来，这源于她对女儿的爱。方母的出场形象，是一个在物资短缺的战乱时期，像保护小鸡不挨饿的母鸡一样表现得市井而自私的包租婆，得知房客不续租后，竟收走了请客的糕点，得知女儿加入地下抗日组织，她向女儿唠叨着：“杀日本鬼子都是英雄好汉，可你这么瘦弱。”但后来她也开始帮助女儿传递情报，并且教导女儿不要连累队友，最终方母被日本人抓走，但打死也没有出卖女儿和队友。

该片就连塑造香港地下抗日主力刘黑仔时也没有赋予他过多的英雄主义的色彩，刘黑仔幽默机智，游刃有余，影片并没有通过冲突强烈的情节设置，去突出他舍己救人、牺牲奉献等“高大全”的品质。

该片没有特别多惊心动魄的抗日杀敌情节，或许是导演有意为之，又或许跟史料不足有关。据说从 1946 年 4 月 30 日香港政府成立到 1997 年 6 月 30 日末代港督彭定康离任的半个多世纪里，他们一直不承认这支在“二战”时期配合盟军英勇作战、长期支援英军服务团进入香港建立情报系统的“游击队”。于是，许鞍华还在片中穿插了以“伪纪录片”形式拍摄的第三条叙事线——梁家辉饰演一位唯一健在的游击队小鬼队成员回忆往事，勾连起上世纪 40 年代的香港渔村与今日高楼林立的国际大都市的前世今生。

正如著名影评人梅雪风所说，许鞍华拍出了最像真人的抗日英雄，他们在历史中微不足道，注定会被遗忘，然而他们付出的代价却是具体而沉痛的，正是这种轻与重的对比，赋予影片打动人心的力量。